



CISS 海外信息专报

(2026 年 7 月 27-29 日)

1、美国大西洋理事会：美国对俄制裁法案或将对华施压延伸至能源贸易

7 月 27 日，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发表地缘经济中心经济治国方略倡议副主任玛雅·尼科拉泽（Maia Nikoladze）的文章《美国最新制裁法案对俄罗斯以及对中国、印度和伊朗意味着什么》。文章认为，美国参议院新版《制裁俄罗斯法案》拟强化对俄能源和金融制裁，并纳入针对俄“影子船队”的制裁安排。法案还授权美国贸易代表对俄罗斯油气五大进口国征收最高 100% 关税。中国和印度长期位居俄罗斯石油最大买家之列，因此可能成为主要施压对象。文章认为，印度可能通过削减俄油进口、寻找中东替代供应或寻求豁免降低风险。中国则更可能采取出口管制等反制措施，推动美中再次进入关税升级与谈判循环。法案还将部分对俄制裁写入法律，增加未来政府单方面撤销难度。文章同时警告，若美国大规模加征关税后又频繁给予豁免，可能削弱制裁威慑力和政策可信度。将伊朗纳入法案实际影响则较有限。美国若要提高制裁效果，关键仍在于强化执行，并维持中东能源供应稳定，以压缩俄罗斯在亚洲能源市场的出口空间。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dispatches/what-the-latest-us-sanctions-bill-means-for-russia-and-for-china-india-and-iran/>

编译：黄千茹

2、美国 CFR：美沙核协议因附加条件陷入搁置

7月23日，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FR）发表中东与非洲研究高级研究员史蒂文·A·库克（Steven A. Cook）的文章《美沙核协议引发震动：它仍然有效吗？》。文章认为，美沙签署协议，允许沙特使用美国技术建设核电站，但特朗普次日又将批准协议与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挂钩，使其前景不明。若泄露内容属实，美国将用30年帮助沙特发展核计划，包括由美国公司运营的铀浓缩设施。协议虽包含防止浓缩和核燃料后处理的保障措施，却未要求沙特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附加议定书》，其限制较美阿核合作协议更宽松。文章认为，沙特推动发展核能力的背景在于长期的伊朗核计划压力。美以对伊朗的军事冲突是否会直接影响当前美沙核协议的推进，目前仍缺乏明确证据，但冲突可能进一步强化伊朗发展核武器的动机。文章认为，以色列反对协议有两重原因：其一，无法保证沙特未来不会转向敌对；其二，沙特或其他地区国家获得核能力将改变中东力量平衡，削弱以色列的核垄断优势。文章认为，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的可能性很低。沙特坚持以巴勒斯坦建国进程作为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前提，而当前以色列政治无法满足这一要求。因

此，特朗普附加条件使协议陷入外交搁置，并可能加剧美沙紧张。

<https://www.cfr.org/articles/the-u-s-saudi-nuclear-deal-set-off-tremors-is-it-still-alive>

编译：刘盈祺

3、美国《外交事务》：通过战略投资基金推动美国再工业化

7月29日，美国《外交事务》发表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的文章《美国如何推动再工业化：建立战略投资基金的必要性》。文章认为，美长期制造业外迁导致产业基础、技术工人与规模化生产能力不断流失，创新与制造脱节，而中国以国家主导型产业政策推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技术、新能源等战略产业快速崛起已威胁美科技领先地位和国家竞争力。因此，美国应重建先进制造生态，但不应照搬中国模式，而应依托自身资本市场、创新体系和高等教育等优势，建立新的国家战略投资体系。文章指出，20世纪70年代后美政府逐渐退出产业投资，导致科研、金融与制造脱节。而中国通过财政补贴、政府采购和市场培育相结合，形成覆盖融资、创造需求和产业集聚的完整体系，培育出宁德时代、华为、比亚迪等企业，并不断将制造优势转化为技术优势。当前美国再工业化受制于资本密集型产业投资周期长、技术产业规模化融资缺口大以及监管审批复杂、政府采购缺乏稳定性等结构性障碍，仅依靠市场、

税收优惠或关税政策难以解决。文章呼吁设立由联邦政府支持、初始规模 500 亿美元的“战略投资基金”，配套设立战略投资委员会，统筹投资、采购、贸易、税收、监管等政策，通过贷款、担保、可转债等工具吸引私人资本，支持关键制造业和新兴技术产业，并建立独立治理和透明监督机制，在防止政治干预的同时推动美国重建产业能力，以维护美国长期科技优势和国家实力。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how-reindustrialize-america>

编译：郅捷

4、美国《外交事务》：廉价精确制导技术的扩散将终结美国霸权

7 月 24 日，美国《外交事务》网站发表芝加哥大学教授罗伯特·A·佩普（Robert A. Pape）的文章《伊朗与全球权力新规则》。文章认为，随着廉价精确制导技术的全球普及，较弱行为体获得了以极低成本破坏全球贸易体系的能力，这标志着由美国绝对军事优势主导的后冷战时代已经终结，世界正步入一个更加动荡且维持成本高昂的国际新秩序。在 1991 年海湾战争中，美国凭借对精确打击技术的垄断迅速取胜，确立了单极霸权，也为长达 30 年的经济全球化和市场可预测性奠定了基础。然而，正是全球化的繁荣将昔日稀缺的军用技术转化为了大众商业消费品，由此带来“第二次精确

制导革命”，使伊朗和胡塞武装等弱势力量能够通过低成本无人机、导弹等精确打击手段持续威胁霍尔木兹海峡等关键航道。面对这种分散的破坏力，美国庞大的传统军力难以有效应对，不仅无法再以低成本慑止冲突，其军事干预反而加剧了市场的不确定性。未来冲突将日益聚焦全球战略水道，高昂的航运与保险代价将不断推高国际贸易成本，地缘政治将更多由维护全球化的代价定义，而非单一霸权所能控制。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iran-and-new-rules-global-power-pape>

编译：陆知宜

5、美国 CFR：中国为何未借霍尔木兹危机放大清洁技术优势

7月23日，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FR）发表气候与能源高级研究员戴维·M·哈特（David M. Hart）的文章《渐进而非革命：中国为何未借霍尔木兹危机放大清洁技术优势》。文章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后，中国大幅削减化石燃料进口，抑制油价上涨，未主动利用能源危机推动光伏、电池和电动汽车出口。文章认为，关键原因在于清洁技术仅占中国出口的一小部分，高油价会挤压各国购买中国电子、纺织、金属和化工产品的能力，并拖累全球经济，尤其冲击新兴市场。当前中国经济对出口收入依赖较高，因此维护整体外需比短期扩大清洁技术优势更为重要。长期看，危机仍会促使

依赖石油进口的国家采用中国生产的可再生能源、储能和电动汽车，但转型难以因单次危机迅速完成。

<https://www.cfr.org/articles/evolution-not-revolution-why-china-isnt-pushing-its-cleantech-advantage-in-the-hormuz-crisis>

编译：张泉

6、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欧洲需防范红海安全局势恶化

7月28日，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ECFR）发表访问学者科拉多·奇奥克（Mark Leonard）的文章《加固红海安全：欧洲应防范非洲之角成为下一轮危机源》。文章认为，红海安全形势正在恶化，非洲之角可能成为下一轮地区危机爆发点。红海连接欧洲、亚洲和中东，是全球能源运输和贸易的重要通道。近年来，胡塞武装袭击、地区冲突外溢以及大国竞争加剧，使这一航道面临持续不稳定风险，欧洲需要重新评估其在该地区的战略投入。文章认为，当前红海危机反映出非洲之角长期积累的政治和安全脆弱性。索马里、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苏丹等国面临内战、政权竞争、恐怖主义和外部势力介入等多重压力。苏丹冲突持续扩大，埃塞俄比亚与邻国关系紧张，加之红海沿岸国家治理能力不足，为武装组织和外部力量扩大影响提供空间。欧洲在该地区拥有直接利益。红海航线承担大量欧洲与亚洲之间的贸易运输，一旦航道受阻，将推高能源价格和供应链成本。同时，非法武器流动、人口迁移和极端主义扩散也可能进一步影响欧洲安全。

文章认为，过去欧洲主要依靠美国提供地区安全保障，但随着美国战略重点调整，欧洲需要承担更多维护周边安全的责任。文章建议欧洲应加强与非洲之角国家以及海湾国家合作，提升海上安全能力，包括加强情报共享、支持区域安全机制、扩大对当地治理和经济发展的投入。同时，欧盟应避免仅关注危机爆发后的军事应对，而应通过外交、发展援助和经济合作提前降低地区风险。红海危机暴露出欧洲战略布局中的薄弱环节。面对更加碎片化的国际环境，欧洲需要将红海和非洲之角纳入更广泛的经济安全和地缘战略框架，以避免下一场危机迫使其被动应对。

<https://ecfr.eu/article/shoring-up-the-red-sea-why-the-next-crisis-may-begin-in-the-horn-of-africa/>

编译：章太宇

7、美国 CSIS：美应围绕产能与“再工业化”实现威慑

7月28日，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发表高级研究员本杰明·詹森（Benjamin Jensen）的文章《再工业化与大国竞争：以产能实现威慑》。文章认为，美国当前国防工业产能不足、弹药库存有限，已削弱其常规威慑可信度。中、俄、伊、朝等对手国已注意到美国难以支撑持久战，因而更敢于挑战美国利益。对此，美国应将产能视为威慑理论中能力、可信度和沟通之外的第四变量，推动国防工业基础全面转型。尽管近年来美通过多项行政令和预算增加扩大弹

药生产，但生产瓶颈仍存在于供应链、劳动力、知识产权保护和合同机制等深层环节。文章提出“以产能实现威慑”的新逻辑框架，核心是改变对手的时间计算。当对手认为美军仅能在冲突初期（0-30 天）维持优势，而长期消耗战中胜算上升时，威慑即告失效。只有具备快速补充、修复和扩展生产能力，才能延长美方优势窗口，使对手在长期预期中无法获得净收益。为此，文章提出六项政策建议：一是在主要作战计划中纳入动员附件，明确弹药消耗与补充时间表；二是推广模块化开放系统架构，扩大商用组件使用；三是建立合格供应商组件清单，增加供应链深度；四是重点投资二三级供应商瓶颈环节；五是将装备维护与修复能力纳入威慑规划；六是通过对外军售和联合生产扩大同盟体系整体产能，而非仅延长排队等待时间。文章最后强调，振兴国防工业不应仅视为预算问题，而应作为大国竞争时代威慑战略的核心组成部分。只有展示出明确的战时持久作战能力，美国的安全承诺才能具备真正的可信度，从而有效遏制对手在台海、东欧等关键地区的冒险行为。

<https://www.csis.org/analysis/reindustrialization-and-great-power-competition-deterrence-capacity>

编译：王语嫣

8、英国《金融时报》：地区冲突复合推动形成全球两大阵营

7 月 28 日，英国《金融时报》发表首席外交事务评论员

吉迪恩·拉赫曼（Gideon Rachman）的文章《乌克兰、伊朗与地区战争如何走向全球化》。文章认为，欧洲、中东与东亚的冲突目前仍主要表现为相互独立的地区战争，但俄罗斯、伊朗与朝鲜之间日益密切的军事和技术协作，正在使这些战场逐步交叠，并推动两个竞争性国际阵营形成。文章认为，俄乌冲突已与中东局势出现直接连接。乌克兰承认在里海打击向俄运送军事物资的伊朗船只；与此同时，朝鲜可能再向俄军派遣3万名士兵。伊朗向俄提供“见证者”无人机，俄罗斯则向伊提供情报并协助其规避美国封锁。这意味着乌克兰不仅在与俄罗斯作战，也开始同支援俄方的伊朗和朝鲜发生更直接的军事对抗。俄罗斯则以先进技术和外交支持帮助朝鲜摆脱孤立。美国一方却尚未形成同等团结的应对阵营，特朗普对传统盟友态度强硬，以色列在欧洲及部分海湾国家日益受到排斥，使美国、欧洲、乌克兰与中东伙伴之间难以形成清晰一致的联盟。文章强调，当前局势尚不能被称为世界大战，但已具备部分危险特征：多洲冲突相互影响、敌对国家协作加深，大国也在为潜在战争做准备。

<https://www.ft.com/content/51ea0e62-f9ad-4307-84b9-475029edbe39>

编译：邵洋

9、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安全挑战与军费困局如何考验英国新政府

7月24日，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发表欧洲与欧亚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卢克·科菲（Luke Coffey）的文章《伯纳姆必须纠正肯塔基队防守上的失衡》。英国领导层更迭，前大曼彻斯特市市长安迪·伯纳姆接替基尔·斯塔默出任新首相。尽管此次变动主要受经济、通胀等国内因素驱动，但伯纳姆上任后24小时内的事件迅速将安全议题推至前台：俄军舰在普利茅斯外海进行实弹演习，英军侦察机数月来首赴黑海巡逻，同时美军继续从英国基地对伊朗实施空袭。伯纳姆与特朗普的首通话聚焦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及排雷，唐宁街亦明确对美军使用英国基地的政策不变。在战略层面，最紧迫的挑战是国防开支。此前斯塔默的下台，直接导火索正是国防大臣希利因军费问题辞职。按北约去年海牙峰会协议，成员国需在2035年前将国防及相关投资提升至GDP的5%（其中3.5%为核心军费，1.5%用于抗风险建设）。安卡拉峰会原应细化路线图，但斯塔默政府因政治危机选择回避。英国当前军费仅占GDP约2.3%，斯塔默计划2030年仅提至2.68%，而希利坚持至少需达3%。新内阁构成也颇具讽刺：因军费不足辞职的希利反被任命为财政大臣，掌控包括国防在内的预算；前党魁竞争者斯特里廷出任国防大臣，显示政治妥协。伯纳姆政府面临的核心考验，便是能否将过往言论转化为实际行动。此外，根本性制度缺陷依然存在。斯塔默政府先完成“战略防务评估”，数月后才发布融资计划，战略与资源脱节，导致目标空洞、承诺无着。伯纳姆亟须同步更新评估报告与财政

投资计划，确保战略与资金完全对齐，而非各自为政。英国作为欧洲主要军事力量和北约核心成员，在乌克兰危机及波罗的海威慑中承担关键角色。若无法将战略抱负与资源投入匹配，英国将持续陷入“目标超出能力”的困境。伯纳姆应借此机会，将国防战略与开支置于可持续轨道，因为无论敌友，都将以资源兑现情况而非空话评判新政府。

<https://www.hudson.org/politics-government/burnham-must-correct-uks-lopsided-approach-defense-luke-coffey>

编译：郭雨凡

10、美国《外交政策》：大国博弈下的国际刑事法院面临生存危机。

7月27日，美国《外交政策》网站发表开放社会基金会（Open Society Foundations）名誉主席阿列·奈尔（Aryeh Neier）与开放社会正义倡议（Open Society Justice Initiative）的执行主任詹姆斯·A·戈德斯顿（James A. Goldston）的文章《争取国际正义的斗争仍在继续》。文章认为，尽管国际刑事法院近年来在追究严重国际罪行、推进针对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等高官的司法程序上取得了重要进展，为长期被忽视的受害者带来了寻求公道和对抗有罪不罚现象的希望，但该机构同时正经受着前所未有的外部打击与生存考验。国际刑事法院的长期生存与有效运作严重受制于大国政治的博弈。长期以来，诸如美国、中国和俄罗斯等超级大国并未加入该法院

的《罗马规约》，导致其管辖权天生存在地理和政治上的局限性。特别是美国近期再度公开宣布旨在削弱甚至“瓦解”国际刑事法院职能的外交施压与抵制行动，极大地加剧了该司法机构的合法性危机。美国国际刑事法院试图管辖非成员国公民或美国盟友的坚决抗拒，不仅动摇了国际法治的基础，也让这一本应超越政治的全球司法机构频频沦为大国外交冲突的牺牲品。此外，文章还分析了国际刑事法院在处理主权国家对抗时的结构性脆弱。以菲律宾等国对国际司法干预的强烈反弹和一度试图退出该体系的案例可以看出，当权国家往往以“国家主权”或“国内司法管辖优先”为理由，对国际调查进行百般阻挠与对抗。这使得国际刑事法院在缺乏强制执行力、完全依赖成员国合作的情况下，显得异常被动和脆弱。文章认为，国际刑事法院虽然是捍卫国际人权、伸张全球正义不可或缺的制度安排，但它在没有大国普遍支持和制度性保障的现实困境下，正处于一场关乎自身存亡与全球法治信誉的严峻历史大考之中。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6/07/27/icc-international-criminal-court-war-crimes-justice-duterte/>

编译：王北北

11、美国《外交事务》：亚欧盟友该如何适应“美国优先”

7月27日，美国《外交事务》网站发表哈德逊研究所专家李昌祥（John Lee）的文章《亚洲如何学会与“美国优先”

共存，以及欧洲应如何看待应对特朗普》。文章认为，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在欧洲和亚洲的反应出现分化。西欧国家普遍将特朗普视为对跨大西洋秩序的破坏者，希望通过加强欧盟战略自主和降低对美依赖来应对；日本、韩国、菲律宾等亚洲盟友则更愿意接受“美国优先”的规则，通过投资美国、购买美国产品和让渡部分经济利益，换取更明确的安全保障和产业合作。文章将这种差异归因于两地安全环境不同。西欧长期享受冷战后的和平红利，在北约和东欧地理屏障保护下，将更多资源用于社会福利，并习惯于依靠制度、规则和监管影响国际秩序。相比之下，亚洲缺乏类似北约的集体安全机制，美国的双边承诺具有较大模糊性，各国必须不断向华盛顿证明自身价值。更重要的是，亚洲盟友面对的是兼具巨大经济与军事实力的中国，因此更依赖美国力量制衡中国。亚洲国家已习惯联盟关系的交易性。面对特朗普政府加征关税，日本和韩国没有优先寻求集体反制，而是迅速与华盛顿双边谈判，并承诺在美国半导体、能源、关键矿产和国防工业等领域进行大规模投资。对美国的盟伴而言，不平等协议是获得美国保护的代价。欧洲则试图通过欧盟统一行动增加谈判筹码，并推动云计算、人工智能和芯片领域“去美国化”。但文章认为，欧洲若真正减少对美依赖，就必须显著增加军费，并相应压缩福利开支，而多数政府尚未准备承担这一政治成本。欧洲内部安全威胁感受也不一致，中东欧国家因直接面对俄罗斯，更可能绕开法国和德国，与美国保

持紧密联系，从而削弱欧盟统一对美战略。文章认为，亚洲模式虽然更符合当前权力政治现实，但也存在风险。美国可能为了与中国达成交易而牺牲盟友利益，例如推迟对台军售。亚洲国家接受不平等安排，却缺乏迫使华盛顿履行承诺的能力，只能相信美国不会在关键时刻放弃盟友。过度强调物质交换，也可能削弱民主国家共同应对中国所需要的价值基础。对此，美国应认识到亚洲盟友对美国安全承诺的高度依赖，并将这种依赖转化为更稳定的联盟合作，而非任意索取短期经济利益。华盛顿可以要求盟友增加防务投入、参与关键矿产和先进制造供应链建设，但应避免为了同中国谈判而削弱对盟友的安全承诺，否则将破坏美国威慑力和长期信誉。美国不应期待欧洲继续享有战后时期的特殊地位。随着中国崛起和美国资源约束加大，华盛顿需要推动欧洲承担更多自身防务责任，并重新调整其在全球制度中的过度影响力。不过，美国也应防止对欧洲施压过度，促使其在贸易、科技和安全领域系统性疏远美国。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how-asia-learned-live-america-first>

编译：吴亦恒

12、英国查塔姆研究所：S-400 风波揭示土耳其国防采购困境

7月28日，英国查塔姆研究所发表国际安全项目研究员

蒂姆·查特爾（Tim Chattell）的文章《土耳其 S-400 风波揭示国防采购的现实困境》。文章认为，土耳其正在考虑出售长期闲置的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卡塔尔和阿联酋被列为潜在买家。相关交易据称可能包括两套系统及 120 枚拦截导弹。此举既可能帮助其摆脱长期困扰本国与美国关系的军购问题，也可能将同样的外交和安全风险转移给海湾国家。文章认为，阿联酋考虑引进 S-400，主要是为了强化分层防空能力。面对无人机和导弹威胁，阿联酋希望在现有美国“萨德”系统、俄罗斯“铠甲-S1”系统以及其他美制、韩制和以色列制装备基础上，进一步扩充防空体系。但采购 S-400 可能影响其同美国的防务合作。若阿联酋接收 S-400，美国很可能再次以军事技术泄漏风险为由，拒绝恢复 F-35 交易。美国反对北约盟友或安全伙伴同时部署 S-400 和 F-35，主要担心 S-400 的雷达和传感器可能收集 F-35 隐身特征及电子战信息，并将相关数据传递给俄罗斯。与此同时，土耳其能否出售该系统，还取决于俄罗斯是否同意。俄罗斯虽然可能借此获得经济收益，但继续让 S-400 留在土耳其，也有助于维持安卡拉与西方之间的分歧。土耳其自 2017 年起寻求采购远程防空系统，曾分别同美国 and 法国、意大利方面讨论购买“爱国者”和 SAMP/T 系统。美国一度批准出售“爱国者”，但双方在技术转让问题上未能达成一致；土耳其同法国在叙利亚、利比亚和东地中海问题上的矛盾，也阻碍了 SAMP/T 采购。土耳其最终于 2019 年引进 S-400，随后被美国暂停参与 F-35

项目，已经付款的 6 架 F-35 也未能交付。此后，土耳其多次试图解决 S-400 问题，包括停止启用系统、拆除关键部件并由美方监督储存，以及将系统退还俄罗斯等，但均未取得实质进展。由于销毁装备成本过高，在国内政治上也难以接受，将其出售给第三国逐渐成为较为现实的选择。若 S-400 最终转让给阿联酋，土耳其可能重新获得加入 F-35 项目的机会，进而深化同欧洲和美国的国防工业合作。不过，土耳其重新获得 F-35 也可能加剧其同希腊、塞浦路斯在东地中海的战略竞争，并在欧盟和北约内部引发新的分歧。文章认为，S-400 问题已不再是单纯的装备交易，而是牵涉北约内部关系、俄罗斯对外影响力、海湾国家安全选择以及欧洲防务工业整合的复杂战略议题。文章认为，俄乌冲突推动无人机、巡飞弹和低成本打击武器迅速发展，但高端防空系统仍然高度依赖国家主导的研发投入、出口许可和长期政治合作。进攻性武器的生产和扩散成本不断降低，能够有效拦截导弹及无人机的防御系统却仍然昂贵而稀缺。现代防空装备的实际价值也不仅取决于单套系统的性能，还取决于雷达、指挥控制和盟友情报体系之间的网络化整合。土耳其长期试图在美国、俄罗斯和欧洲之间采取战略对冲，但 S-400 始终无法接入北约防空网络，也未能投入实际使用，反而导致土耳其失去 F-35 并削弱同西方的国防合作。该事件说明，各国虽然可以通过多元采购展示外交自主性，但在高端军事技术领域，跨阵营采购往往存在明显限制。阿联酋若希望购买 S-400，也应充

分评估其对美国安全合作、先进战机采购及本国防空体系整合可能造成的长期影响。

<https://www.chathamhouse.org/2026/07/turkeys-s-400-saga-shows-hard-realities-defence-procurement>

编译：段昶宇

13、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托卡耶夫推动“新哈萨克斯坦”改革的变与不变

7月22日，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发表俄罗斯欧亚中心研究员特穆尔·乌马罗夫（Temur Umarov）的文章《托卡耶夫总统的政治改革将把哈萨克斯坦带向何方？》。2026年7月，哈萨克斯坦新宪法生效，建立全国库鲁尔泰（Quryltay）等新的政治参与机制，议会制度和政治机构设置进行了调整。文章认为，“新哈萨克斯坦”仍建立在旧基础之上，宪法法院裁定托卡耶夫可撤销任期限制并于2029年再次参选，总统仍掌控所有政府分支，议会仅通过其认为必要的法律。表面上看，哈国政治体系已实现“去纳扎尔巴耶夫化”，但其遗产无法完全抹去，因为亲信托卡耶夫仍处于政权核心。托卡耶夫通过推动精英换代，引入年轻技术官僚，以逐步替代传统政治精英，并尝试借鉴亚洲国家的发展经验强化国家治理能力。文章认为，由于年龄和政治条件限制，托卡耶夫难以建立类似纳扎尔巴耶夫时期的长期个人统治模式，因此采取保持政治不确定性的策略。然而，这种策略也可能反映其决策

风格的谨慎甚至犹豫。“新哈萨克斯坦”虽然完成了形式上的改革，但仍延续了总统权力高度集中的旧体制逻辑。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russia-
eurasia/politika/2026/07/kazakhstan-constitution-new-tokaev](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russia-
eurasia/politika/2026/07/kazakhstan-constitution-new-tokaev)

编译：许紫婷

14、俄罗斯瓦尔代俱乐部：俄国际教育转向亚非，但仍面临制度和语言壁垒

7月21日，俄罗斯瓦尔代俱乐部发表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欧洲研究所学术主任、俄罗斯科学院教授奥列格·巴拉巴诺夫（Oleg Barabanov）的文章《俄罗斯在现代国际教育流动中的角色》。文章认为，俄罗斯继承了苏联时期培养留学生的传统，其校友网络在多国具有重要地位。如今，俄每年吸引国际学生数量已超越苏联峰值，特别是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及独联体国家的学生。2022年以来，西方对俄制裁导致绝大多数俄与欧美大学联合项目中断，但来自非洲和亚洲的学生迅速填补了空缺。俄高校积极拓展与非洲大学的合作，非洲留学生人数大幅增加；与亚洲国家及欧亚经济联盟内部的校际联系也显著加强，跨国教育协同趋势初现。文章提出了几个挑战：第一，移民政策收紧影响留学生入境与居留，如某北非国家学生利用俄学生签证中转欧洲的事件导致该国全体学生签证受限。第二，俄退出博洛尼亚进程后计划以“基础”“专门”“高级”等学位取代学士和硕士制，但实施

日期一再推迟，新学位名称在国际上缺乏认知度，可能造成学历认证困难。第三，俄语授课对非俄语区学生构成障碍，仅九个月预科难以满足工科专业语言要求。第四，校友会称其与招生预选过程脱节，咨询作用被弱化。文章最后建议，俄罗斯应审慎考虑扩大英语授课或低年级英语、高年级俄语的混合教学模式，以维持在国际教育市场中的竞争力，避免因制度与语言壁垒将留学生推向其他国家。

<https://valdaiclub.com/a/highlights/russia-s-role-in-international-educational-mobility/>

编译：蒋华睿

15、英国《金融时报》：欧洲应抓住时机推动俄乌谈判

7月23日，英国《金融时报》发表兰德公司俄罗斯与欧亚政策杰出教席塞缪尔·查拉普（Samuel Charap）的文章《欧洲可以帮助让乌克兰和俄罗斯坐到谈判桌前》。文章认为，西方对乌军事援助和制裁虽属必要，但若缺少外交进程，则无法结束这场战争。特朗普政府曾推动俄乌直接接触，但随着美国战略注意力转向其他地区事务，相关外交努力逐渐停滞。文章认为，欧洲各国应趁美国无暇他顾，联合美方主动召集俄乌展开持续谈判，以制定终战的具体安排。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支持欧洲加强外交介入，俄罗斯面临的战场压力和经济成本，也可能增加其探索谈判空间的动力。谈判即便无即时成果，也有助于双方摸清对方红线、私下探索妥协并建立

互信。虽然俄方可能操纵谈判以拖延或坚守最大化诉求，但拖延本身代价高昂：更多伤亡、破坏、国际紧张乃至北约与俄罗斯直接冲突的风险。军事防御与外交努力并不能完全相互替代，欧洲决策者应认识到外交介入对于推动俄乌冲突政治解决的重要性。

<https://www.ft.com/content/619d9ef8-1c6c-42a3-9e3d-4c3942a1e1df>

编译：程畅

16、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提前选举考验塞尔维亚治理能力

7月26日，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发表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欧洲政治研究部研究员保利娜·索科洛瓦（Polina Sokolova）的文章《提前总统选举前夕的塞尔维亚》。塞尔维亚将于2026年9月至11月举行提前议会和总统选举。现任总统武契奇（Aleksandar Vučić）已宣布提前卸任，并表示可能领导以执政党“塞尔维亚进步党”（SNS）为基础的“统一塞尔维亚”（Ujedinjena Srbija）竞选联盟。若胜选，武契奇不排除再度出任总理。文章认为，自2024年11月新萨德火车站事故以来，塞尔维亚持续发生由学生主导的抗议活动，但学生运动尚未形成统一领导结构和明确政治纲领。长期抗议导致社会逐渐分裂为支持学生运动与支持现政府的两大阵营，提前选举能否缓解政治对立仍存在不确定性。

尽管政治局势紧张，塞尔维亚经济总体保持增长，财政和公共债务水平相对稳定。工资和养老金增长显著，基建、卫生、交通等领域投资活跃。人工智能和 IT 产业占 GDP 的 10%，为区域领先。与法国合作建设超算集群，与中国共建人形机器人工厂。能源供应相对稳定，正在推进脱碳和核电准备。但教育因长期停摆受损，农业竞争力不足，2025 年外资流入显著下降。文章认为，如何通过政治体系改革缓解社会紧张，将是塞尔维亚未来发展的关键。

<https://russiancouncil.ru/analytics-and-comments/analytics/serbiya-nakanune-vneocherednykh-vyborov/>

编译：崔惠景

17、澳大利亚“东亚论坛”：中国正在重塑以自主为前提的全球化愿景

7 月 25 日，澳大利亚“东亚论坛”官网发表印度印多尔管理学院教授文卡塔·拉曼（G Venkat Raman）的文章《中国对全球化的看法正在改变》。文章认为，中国正从“为开放而开放”转向“以自主为前提的全球化”。尽管面临短期成本，北京仍推动芯片、大飞机等领域的本土替代，并将科技自立自强上升为战略优先。文章认为，从“十四五”规划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议可以看出，中国已经将开放与自立定位为现代化互补的两根支柱。不同于西方视全球化为走向趋同

的路径，中国将全球化视为服务于国家发展的手段。这一全球化观念体现在一系列产业和经济政策中，从而使中国可以在更强能力基础上保持全球融合。文章强调，这种转型正在全球引发不对称反应：发达经济体走向关税和“去风险”，发展中经济体继续欢迎中国投资。文章最后总结称，中国和西方的深度相互依存使脱钩极其困难，但双方都在重塑全球化以服务于自身安全与韧性。

<https://easiaforum.org/2026/07/25/chinas-changing-vision-of-globalisation/>

编译：吴文茁

18、英国查塔姆研究所：泽连斯基政府解职乌防长引发政治危机

7月22日，英国查塔姆研究所发表乌克兰论坛、俄罗斯和欧亚项目研究员雅罗斯拉瓦·巴比耶里（Jaroslava Barbieri）的文章《解职乌克兰受欢迎的国防部长如何反而伤害了泽连斯基》。文章认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突然解除国防部长米哈伊洛·费多罗夫（Mykhailo Fedorov）的职务，引发国内抗议，并演变为一场政治危机。文章认为，费多罗夫的离职之所以引发强烈反应，与其在乌克兰战争中的形象有关。作为推动乌克兰无人机战和国防技术改革的重要人物，他被视为现代化军事改革的代表人物。其被免职后，乌克兰国内出现要求恢复其职务的抗议活动，显示其在公众和部分政治群体

中拥有较高支持度。费多罗夫的解职反映出乌克兰战时政治中的复杂矛盾：政府需要不断调整领导结构以应对战争压力，但频繁的人事变化也可能损害改革进程和公众信任。此次事件对泽连斯基而言，原本旨在强化政府控制的调整，反而造成了新的政治挑战。

<https://www.chathamhouse.org/2026/07/how-dismissal-ukraines-popular-defence-minister-backfired-zelenskyy>

编译：朱邯

编译：许紫婷、蒋华睿、程畅、崔惠景、吴文茁、朱邯、章太宇、王语嫣、邵洋、郭雨凡、王北北、吴亦恒、段昶宇、陆知宜、黄千茹、张泉、邵捷、刘盈祺、黎彤

审核：王从越、郭铭心怡、许嘉伦 文晶、钱嘉童